



# 走過從前一從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回顧日治時期的學生生活

孫錫忠／國立花蓮高級中學教師

花蓮，一個被稱為「後山」的美麗城市，經過這幾十年來的發展，逐漸擺脫了「產業東移」的經濟政策，開始轉型成「悠遊花蓮」的觀光政策，尤其在今年年初為期十天眾星雲集開唱在花蓮的活動及政治上蘇花高興建與否的議題討論爭執，更使得花蓮這一個城市開始受到國人更多的注意與關心。本人很幸運在去年八月通過花蓮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甄選，舉家從繁華的台中市遷移到這背山面海的花蓮市定居，也開始更進一步認識從日治時代就成立至今的國立花蓮高級中學（以下簡稱花中）。

花蓮高中成立至今已超過七十個年頭，在這個不算短的歲月中，橫跨了日治及民國兩個時期。雖然時間漫長，但校史資料表卻保存相當完整，令人感到相當的驚豔。特別是至今仍有日籍畢業生每兩年組團回母校參訪，流露出校友對母校的懷念。本文透過花中校史室所典藏的資料、照片，並蒐集歷屆校友的回憶，試圖勾勒出日治時期花中的學生學習生活。畢竟民國時期以後的台灣的教育發展大家都不陌生，但日治時期台灣有關中等教育的田野資料卻並不多見，包括課程內涵及學生生活，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方式下，很多情況都是超乎大家所能想像。透過本文資料的蒐集及撰寫，進一步體會花中（1936-1945）在日本教育制度下的形形色色。

## 一、日本對台的教育政策與花中的成立

自甲午戰爭清廷失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日本對於台灣的教育政策，根據日本基督教和平主義殖民學者矢內原忠雄（1988年）在《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指出：

歷代台灣總督的施政方針，可以在1918、19年之交，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施政是立基於對台灣特殊性的認識，尊重原有習慣，在政治上對本島人實施差別的警察專制統治，在經濟上則發展島內產業之資本主義化，確保內地官僚及資本主義勢力；後期從強調台灣之特殊性轉為政治上主張內地延長主義、同化主義、提倡民族融合，經濟上則強調台灣產業與日本內地的聯絡及像華南、南洋的方展。就教育而言，前期可說是配合政治統治上的目的而推動實用性的日治教育，後期則企圖以教育的力量同化台灣人<sup>1</sup>。

在學制名稱上，小學唸六年，但日籍學生與台籍學生卻分別設校：日本人念的是「小學校」、台灣人唸的是「公學校」。初期台籍學生只能唸到小學畢業，這使得台籍學生的教育受到壓抑，也使得台灣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更進一步的教育機會盼望更加強烈。

西元1914年，台中士紳林獻堂等為了台灣人子弟受教育的問題，發起創立台中中學運動，由霧峰林家、板橋林家及辜顯榮等二百多位台灣士紳捐資二十四萬八千多圓，向總督府提出申請。日本接受這些捐資後，由總督府於翌年二月公布台灣公立中學官制，在台中設立「公立台中中學校」（即今台中一中前身），接受台灣人子弟的入學，招收

<sup>1</sup> 吳密察（民80）：台灣近代史研究，頁181。



修完四年公學校年滿十三歲以上之台灣學童，施以初中程度的普通教育<sup>2</sup>。當時採男女分校，男生唸的是「中學校」，女生念「高等女學校」。

台灣總督府於1933年（昭和8年，民國22年），因應花蓮地方需求及民間集資，根

據「台灣公立中學校規則」成立「廳地方費立花蓮港中學校」，次年改為「廳立花蓮港中學校」，直至光復後才改為「省立花蓮中學」，而後經歷精省後，改名為現今「國立花蓮高中」。所以「廳立花蓮港中學校」可說是花中成立的初期階段。



1936年校門

## 二、學制與課程

花中成立時的學制為五年制中學，每一學年分為三個學期。在入學資格上，學生入學必須經過考試，包括學科考試、人品考核（由小學申報）以及口試。在當時日本執行殖民政策下，台灣同胞想考進五年制之普通中學校，想要考入學校實屬不易。加上日本政府不願台灣同胞讀較高學校，甚至限制本省同胞錄取名額最多以30人為上限。在學費方面，一般台籍家庭月收入約20幾元，而花中註冊費一學期日幣10年，一學年三學期共30元，所以學費負擔算是蠻大。

日治時期花中的校訓為：

- （一）尊奉教育有關的聖旨，身躬力行，以報答皇恩。
- （二）銘記父母師長及國家、公眾的恩惠，以致誠力行表現恭謙，勤敏報恩之心。
- （三）尊重信義，敦厚友誼，發揮團結合作一致的實效。
- （四）培養務實剛毅的風氣，以不屈不撓的精神，達成預定的目標。
- （五）注重衛生，謀求強健身體。

從校訓中更能看出學校辦學主要目標是培養學生對國家的效忠、對長輩對尊重及身體保健課業學習、不屈不撓特質，課業學習反而變成次要地位。

<sup>1</sup> 吳密察（民80）：台灣近代史研究，頁150-156。



由於日本實施天皇制度，加上厲行軍國主義，教育必須配合政治及軍事的需求，因此除了一般課程之外，又附加許多額外的特

殊課程。在一般課程內容，根據第一屆「生徒手帳」（學生手冊）所列的學科課程及每週教授時數，列表如下：

花蓮港中學校學科課程及每週教授時數一覽表

學年 科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時數	課程	時數	課程	時數	課程	時數	課程	時數	課程
修身	1	道德要領作法	1	同左	1	同左	1	同左	1	同左
公民科							2	公民的生活 法制經濟社會 上適應事項	2	同左
國語 漢文	8	國語講讀 作文 習字 話方	8	國語講讀 漢語講讀 作文文法 習字	6	國語講讀 漢語講讀 作文文法	5	國語講讀 漢語講讀 作文文法	5	國語講讀 漢語講讀 作文文法
歷史 地理	3	國史 日本地理	3	東洋史 日本地理	3	東洋史、西洋 史、外國地理	3	國史、西洋史 外國地理	3	國史 地理概說
外國語 (英語)	5	發音、綴字、 聽方、讀方及 解釋、話方及 作文、書取、 習字	5	同左	6	聽方、讀方及 解釋、話方及 作文、書取文 法	4	同左	4	同左
數學	3	算數 代數 幾何	3	代數 幾何	5	代數 幾何	4	代數 幾何三角	4	同左
理科	2	博物	3	博物 物理及化學	3	同左	5	同左	5	應用理科
圖畫	1	自在畫	1	同左	1	自在畫 用器畫	1	同左	1	同左
音樂	1	歌曲樂典	1	同左	1	同左				
作業科 (農業)	2	園藝一般實習	2	同左	2	同左	4	農業大意實習	4	同左
體操	5	體操.教練.劍道 .柔道.遊戲及競 技	5	同左	5	同左	5	同左	5	同左
合計	31		32		33		34		34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課程的安排上，語文課程佔有重要比例，史地課程也是從日本地理為出發點，逐漸擴展至東洋及世界地理及歷史，完全以從日本看世界觀點的教育觀點。值得一提的是體操課時數與內容幾乎與語文課程的比重相差不遠，課程包含體操、教練、劍道、柔道、遊戲及競技等，這應該是與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強調健身報國的時

代背景有關。也是因為這緣故，使得體育活動一直是花中學生的熱愛的活動。就總時數而言，語文類佔34.1%，包含日語、漢語與英語。藝能類包括體操、農業、畫圖及音樂，佔28.6%。數理類佔22.6%，社會科包括歷史、地理、修身及公民，戰14.7%。成績考評方式也因科目不同，而有所不同。

項目	考評方式
修身、武道	每學期期末考試一次，以百分位給分
學業成績	以「優、秀、良、可、不可」五個等第來評定
操行成績	以、甲、乙、丙、丁評等
年級班排名	以「特、上、中、下」四個級群來定位
五年表現之畢業榮譽	優等賞、皆勤賞、精勤賞、功勞賞等四種

值得一提的是在操行成績的評定，一般台籍學生都是乙等，如果有抽煙、打架、在外服裝不整、上課常常遲到等違規，操行就會被評定為丙等，學校會通知家長到校處理。一般而言，只有日籍優秀學生才可能被列為甲等。在一般學期結束學校並沒有頒獎，只有在畢業典禮時，才會考核五年學習成績，頒授優等賞（品學兼優獎）、皆勤賞（全勤獎）、精勤賞（五學年只請兩三次假的鼓勵獎）及功勞賞（班級貢獻或社團表現獎）。

花中的留級制度實施相當徹底，台籍、日籍皆一視同仁。留級的標準是：

- （一）學年總平均成績未達六十分；
- （二）學科五十分者有三三者；
- （三）學科四十有兩科者；

（四）學科三十分有一科者；

（五）一年級升二年級需留級約十名左右。

以第二屆學生升級人數的變化為例，從入學開始到畢業的人數，分別是：一年級109人、升二年級時變成97人、升到三年級時變成87人、升到四年級時變成77人、升到五年級時變成73人。由於台籍學生人數招生受限，雖然在數量上比不上日籍學生，由於考進花中相當不易，加上留級制度的實施，所以台籍學生一般都很用功。住宿的同學晚上除了自習時間外，等到舍監熄燈回家後，一個個偷偷起床，躲到留有昏黃燈光的浴室中讀書。所以每逢考試，一般而言台籍學生成績都表現較日籍學生來的突出。



日治時期宿舍餐食

### 三、師資與學習

日治時期由於實施殖民教育，學校校長也都是由日本人擔任。花中前三任校長也都是日本人擔任。花中第一任校長是崛辰已先生，由於當時花中是在地方人士募集資金，故在倉促成立時並沒有完整的校舍。上任校長首先需解決的問題是校園建設工程。開學之初由於沒有教室，只好暫借他校教室。開

校後一年半，完成了第一期的工程，在校長親自指揮下，動員所有學生搬遷課桌椅、器材與設備、整理校園環境，奠定花中學校基礎設施。1941年第二任校長為清水善次郎，當時他面對花中師資不足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遠度回日本尋求師資，但事與願違在返日航行中不幸遇到戰爭，所搭之船遭美軍魚雷擊中而殉職。



古校園前庭



這一時期的教師清一色都是男性日本籍，「嚴管勤教」是教師們奉行的圭臬，第一屆校友葉鳴岡回憶：「教史地的山崎老師，地圖畫得極好，歷史課也很有思想啟發；但對同學很嚴厲，尤其對台灣學生近乎苛求，一有違逆，不只一巴掌打過來，甚至拳頭打在頭上，大家都很怕他。光復以後，很多老師回台探望，他不敢回來，他對日本同學說以前對台灣人有一點偏見，所以現在不敢回去。過世後，他的夫人來台也這樣講，說先生對台灣人有一點毛病，但是他有交代，好像日幣三十幾萬，她說先生交代樂捐給學校，可見他對花中還是很有感情的，這就是日本人！教理化的北澤教導主任對同學的嚴峻要求，也讓同學一生受惠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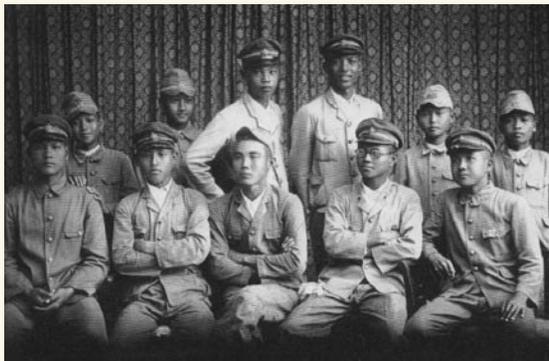
雖然有嚴格的教師，但也有更多關愛學生老師，葉鳴岡校友亦指出：「英語神古老師、劍道金子老師給予住校同學師情的鼓勵關懷。那時候的導師，中午飯一定要和學生一同在教室裡用的。飯後，我們可以請教老師學業和其他一切事情。有時，老師命我們飯前各個的便當打開給他看後才用餐，有一次老師看到我的便當只有鹹魚，沒有其他的菜，大家飯後，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問我的生活環境，當然我感謝他的關懷，但對「貧」字一句也講不出來，只知道，在老師的鼓舞下，我向上奮發以進的力量，更加堅定。」

至於老師專業學識，也極為學生們肯定，例如葉鳴岡校友提到：「數學池田老師為同學扎下了三角、幾何、代數的深厚

基礎；教東洋史（也就是中國史）的導師山崎先生，很詳盡為我們闡述中國的大同思想，也因此，我的心底開始萌生了對中國正統文化的信仰，山崎先生這種胸襟，真讓我佩服。」這也顯示「學術」超越「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

在生活教育方面，透過軍事化的管理，如服儀嚴格規範，要求學生學習到生活禮儀規範自我要求。並且實施學長制，透過學長監督及要求學弟方式，徹底落實生活教育的規範。第二屆校友原田整一對此一情景有以下的回憶描述：「軍國主義下的生活常規要求異常嚴格，學生理光頭，平常的行止表現，被嚴格要求得像很有教養的孩子，只要一離家門，無論上學或外出，服裝儀容的整齊敬肅是基本的分寸。在學校，不僅學生冬季、夏季都穿著土黃色的制服學生帽，連校長、老師也有黑色的制式長官服。木屐只能在家裡穿，出外一定穿皮鞋。帽子也要戴的端正、平整，不可斜戴、歪戴，否則馬上就被糾正。從制服衣領上別著的徽章記號，也可以識別出就讀年級，學弟遇到學長都要敬禮，不然就會被賞巴掌！種種生活上的規矩，好像老師沒有硬性規定，風氣就是如此。其他社團活動如棒球、劍道、田徑、相撲等等，也都講求服裝整齊，禮儀周到的基本運動精神。每到體操（柔道）時間，換上純白色的運動服，整齊排列，短褲紐帶向中央肚臍處對正，衣褶向腰間兩邊拉視，總是這樣被要求著」<sup>3</sup>。

<sup>1</sup> 石秋亮（90）：濤聲歲月-創校初期的花蓮中學，頁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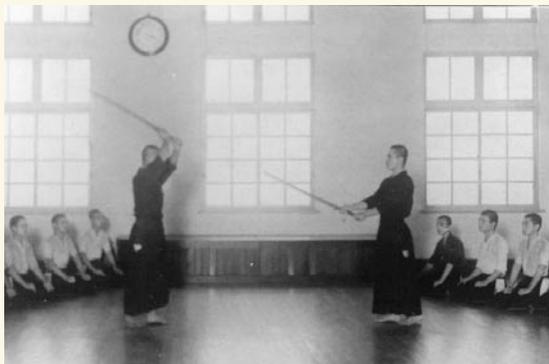
日治時期制服

實施學長制只是想透過學長要求來落實生活規範，但因為在殖民政策氛圍下，日籍學生的優越感使得學長制亦有負面的影響。根據校友王乾旺回憶：「學長沒什麼規定的，有時候就看學長的高興，其中也會有日本人想欺負台灣人的味道，或者顯顯威風！」「有一天，我和一位日籍同學騎腳踏車，因為沒向從側面老遠走來的日籍學長行禮，結果被叫住立正站好，我那日籍同學反應快，馬上向學長道歉、賠不是，得以離開，我則被打了兩個耳光！」。

在體育活動方面，由於體育課程是健身的基礎，所以學校非常重視，課程內容有棒球、劍道、馬拉松等等，可說是相當豐富。棒球一直是學生最活躍的運動，校長經常延

請日本內地職業選手、奧運田徑國手來花中指導校隊訓練。選手們在炎熱夏天拼命苦練，並於1941年秋天，獲得台灣中學校棒球比賽冠軍，準備次年春天將代表台灣參加在兵庫縣甲子園球場所舉行的全日本棒球比賽。但後因珍珠港事件，甲子園比賽而因故停辦，十分可惜。

劍道則是納入正式課表當中。每年冬天有一個月寒訓，在天還沒亮就要到學校來，連續每天清晨練一個小時。所以五年的學習下來，一般同學能夠從五級、四級進到三級、二級就算很不錯的，也只有日籍專業訓練的同學可以升到一級甚至初段以上。在1943年（民國32年），花中學生在全台灣中學校劍道比賽，獲得「全島優勝」的冠軍殊榮。



體育館（健身房）內劍道活動



馬拉松比賽每年舉辦一次，根據第二屆校友原田整一回憶：「同學最熱衷的莫過於每年都舉辦的馬拉松賽跑，通常一年級是跑到吉野（今吉安），二年級則跑到新城，那真是體力與耐力的訓練與考驗。有一年甚至舉辦花中、花女（即今花蓮女中）小型馬拉松會跑，「起點在花崗山，折返點在吉野小學（今吉安國小）。由女同學先出發，三十分鐘之後男同學才起跑。在信號槍響後，所有人儘願著追女生不落人後的跑出去，根本顧不得其他成員。但跑到差不多專賣局前面，幾乎大多數的人都已經氣喘咻咻，在那裡等著同隊其他伙伴的到臨，我們的同學感情也因此更加凝聚，那真是甜美的一段回憶」。

除了正課外，課餘活動時間是在每天下午三點半正課結束後至放學前，及星期六下午，學校安排了許多的社團活動，例如：運動類的網球、田徑、游泳、射箭及較特殊的輕飛機部（即以人力快速拉繃80-100公尺後即可升空的滑翔機）等。在文藝社團活動方面，依據第二屆校友王地俊回憶說：「文化活動方面有學藝部、圖書部、會刊部、喇叭部等，都在各自的領域中努力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喇叭部常到陸軍大隊部去接受信號喇叭進行曲的練習，隊長葉鳴岡（第一屆校友）是個很優秀的學生，那時他住在現今建

國路平交道附近，郊區沒有什麼人，他一大早上學便沿路吹奏著喇叭，走到市區便開始背英文單字，一直邊讀邊走到學校，還因此在首屆畢業學生中榮獲『功賞獎』呢！」

「百聞不如一見」的修學旅遊也是課程活動中重要的一環，具體表現在修學旅遊的活動安排上。此種活動分為「畢業旅行」及「攀登高山」兩部分。在「畢業旅行」安排上，學校規劃讓畢業學生能到日本去參訪，所以當時有規定每人每年存款10元，五年可存50元（當時公務員薪水每月是45元）。第一屆學生在昭和5年出發到日本，走訪了東京、京都、奈良、伊勢等地，第二屆以後因戰事擴大而無法成行。旅遊修學另一部份是「攀登高山」，在攀登高山的安排上，主要是攀登新高山（即玉山，因高於日本最高富士山而名之）及阿里山，採自由報名參加。根據校友王乾旺回憶：「登山活動是自由登記參加，利用暑假期間舉辦，有老師帶隊，坐午夜火車南下後，天亮從玉里入山，四個晚上沿途夜宿瓦拉米（蕨村）、大水窟、八通關、林務局綠林山莊等派出所，派出所裡面很寬敞，他們還煮飯給我們吃，子夜十二時開始登頂，以便五、六小時候趕得上觀看日出，登上玉山頂峰時，太陽冉冉上昇，照亮大地，大家振臂歡呼、攝影留念，3950公尺喔！再久我都記得！」



日治時代登新高山（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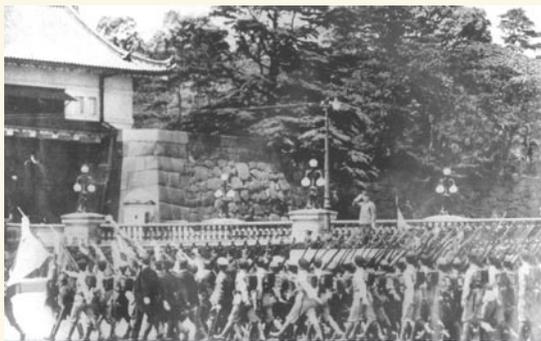


除了前面所說的一般課程外，針對戰爭時局所需，另外有許活動加以配合，例如神社參拜、社會勞動、軍事體能訓練等等。學校每天朝會升旗，都朝東方向天皇宮城行最敬禮，而在元旦新年、神武天皇登基、明治天皇誕辰、昭和天皇誕辰等重要日子，學校都會集合學生奉讀〈教育敕語〉，不僅要背誦，有時還考默書。每年考上花中新生，在入學時全體由老師率隊到花蓮港神社（今忠烈祠）參拜。10月25日的神社紀念日，全校師生也要帶隊徒步越過美崙山，到神社恭敬參拜。每年畢業典禮儀式中，也安排有「宮城遙拜」、「敕語奉讀」等項目以表示效忠、感恩，這是日治時代的將政治融入於教育特色。

社會勞動的主力大都投入戰爭的行列，所以中學生也在正常課業之外，被要求參與義務勞動，從事生產食物與修築防禦工事，因此，花中的學生就會輪流出現在軍隊橋（今中正橋）邊的阿兵哥營區割草（因為留守的阿兵哥太少，草長得很快）在現在的高爾夫球場土地上種地瓜（供食用）、種蓖麻（可做飛機潤滑油），甚至被動員去北埔飛機

廠參與修築戰鬥機掩體工程，並沿海岸線挖掘防禦戰壕，只有在雨天的時候才能上課，過著「晴耕雨讀」的患難生活。

軍事體能訓練方面，在軍國主義的教育制度下，軍事體能的訓練尤為重要，除了學校管理軍事化外，課程上也將軍事教育納入於課程之中，其重要性甚至超過其他課程。第八屆畢業生關叮芳回憶說：「隨著戰爭的需要，學校課程也做了彈性的調整，首先當然是更加重軍事教育，在軍國主義的思想下，學生的一切行動自然更軍隊化，每個同學都不敢輕視軍事教練，其他的課業再怎麼好，如果軍事教練不及格，根本無法升級，也不能畢業。軍訓課的內容是基本訓練（立正、稍息、分隊、小隊、中隊、戰鬥訓練（三八式步槍、輕機關槍、手榴彈等各式武器的分解與使用）。中餐過後，有時候還要到美崙山練兵場（今縣政府附近）操練，每年還要參加花蓮地區中學生與在鄉軍人暨青年學生的聯合野外演習，分『紅（北）白（南）軍對抗』。甚至第一屆學長還派代表赴日本東京皇室宮城，接受天皇對全日本中等學校學生隊伍代表的軍訓校閱」。



日治時代第一屆同學回日本參加校閱



從上述可以窺見到日治時期花蓮高中學生的學習百態。在課程上，顯而易見的，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以配合戰爭的需求為第一要旨，所以軍事訓練、體育活動不論是在時數上及重視程度上均不比其他的科目差。而其他隱性課程，如神社參拜、社會勞動等設計，更顯示出教育國家化。

### 四、在烽火中學習與成長的花中學生

因為花中成立適逢戰時，在太平洋戰爭中，同學也經歷了送別老師嚴肅出征的悲壯行程，甚至也接收到老師戰死沙場的感傷訊息。被調皮學生戲稱為「芝麻」的教務主任北澤正出征後，也在戰爭末期，因砲彈無法擊發而被炸死了。同學的父兄也有不少征戰不久就傳回陣亡不幸。有校友回憶說：「我們中學生排隊去車站，不是送別受召出征的軍人，就是迎接戰死軍人的灰骨！戰爭期間，我們花蓮中學排隊去車站，不知送走了多少軍人到中國大陸去，也不知迎接了多少戰死者灰骨回來，由此可知中日戰爭的激烈了！」。「為因應太平洋戰爭的需要，學寮（學生宿舍）最後被提供為日本空軍使用，看到有些神風特攻隊員在寮壁上留下辭世的遺言，讓人感覺到戰爭的殘酷可怕。」

根據14級校友楊守全回憶：「花蓮港，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是日軍南洋補給線的重要中途站。那時候，日軍已相當缺少大

型運輸艦，大部分的軍需品，靠著小型的木造船沿著琉球、台灣、菲律賓這一路線運往南洋…那時候，美軍的機動部隊幾乎完全控制了台灣東部海面的制空權，幾乎每天都有美軍的艦機傳來炸射進出港口的船隻。…那時候，我們真正在校舍上課的日子並不多，大概不到一學期。因時局緊張，軍隊進駐了學校，學生只有利用學生宿舍上課，而實際上課的時間不多，大部分的時間都幫軍隊作工程，叫做「奉仕作業」。…有一次，美軍機動艦隊迫近東部海面，艦載機大舉射炸花蓮市區，花中宿舍學生緊急避難到美崙山山洞裡。因為三餐供應困難，加上留在花蓮實在太危險，所以三天後決定利用夜間行軍（花蓮市及附近的鐵路、公路已遭破壞）返回鄉下。當學長們帶領我們行經花蓮市區時，到處可見房屋正在燃燒，路邊有不少草蓆蓋著的死者，和呻吟的傷患。」這段與戰爭相伴的學習生活，花中學生變成了烽火學子。

### 後記

歷史原是一條不斷向前奔流的長河，沒有過去也就無法成就現在。在花中早期建校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日本教育制度的特色，這也讓台灣後來的文化發展，充滿一股濃濃的東洋味。戰爭的烽火，無情的改變了歷史，分別了國籍，可是母校還是母校，故鄉還是故鄉，無論台籍、日籍，花中依然是這一代學子一生濡慕的家園，而花蓮永遠是他們衷心認同的地方。

### 參考文獻

吳密察（1911）：台灣近代史研究。

石秋亮（2001）：濤聲歲月—創校初期的花蓮中學。

花中60週年校慶特刊。

花中70週年校慶特刊。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學校發展史之研究》，葉日陞，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4年。